



人间

老母为我“扎红”

文/冯骥才

今年是马年,我的本命年,又该扎红腰带了。

在古老的传统中,本命年又称“槛儿年”,本命年扎红腰带——俗称扎红,就是顺顺当当“过槛儿”,寓意着避邪趋吉的心愿。故而每到本命年,母亲都要亲手为我“扎红”。记得十二年前我甲子岁,母亲已八十六岁,却早早为我准备好了红腰带,除夕那天,亲手为我扎在腰上。那一刻,母亲笑着,我笑着,屋内其他人也笑着,我心里深深地感动。所有孩子自出生一刻,母亲最大的心愿莫过于孩子的健康与平安,这心愿一直伴随着孩子的成长而执着不灭;而我竟有如此洪福,六十岁还能感受到母亲这种天性和深挚的爱。一时心涌激情,对母亲说,待十二年后,还要她再为我扎红,母亲当然知道我这话里边的含意,笑嘻嘻连连说:好好好。

十二年过去,我的第六个本命年来到,如今七十二岁了。

母亲呢?真棒!她信守诺言,九十八岁寿星般的高龄,依然健康,面无深皱,皮肤和雪白的发丝泛着光亮;最叫我高兴的是她头脑仍旧明晰和富于觉察力,情感也一直那样丰富又敏感,从来没有衰退过。而且,今年一入腊月就告诉我,已经预备了红腰带,要在除夕那天亲手给我扎在腰上,还说这次腰带上的花儿由她自己来绣。她为什么刻意自己来绣?她眼睛的玻璃体有点小问题,还能绣吗?她执意要把深心的一种祝愿,一针针地绣入这传说能够保佑平安的腰带中吗?

于是在除夕这天,我要来体验七十人生少有的一种幸福——由老母亲来给扎红了。

母亲郑重地从柜里拿出一条摺得分外齐整的鲜红的布腰带,打开给我看;一端——终于揭晓了——是母亲亲手用黄线绣成的四个字“马年大吉”。竖排的四字,笔画规整,横平竖直,每个针脚都很清晰。这是母亲绣的吗?母亲抬头看着我,说:“你看绣得行吗,我写好了字,开始总绣不好,太久不绣了,眼看不准手也不准,拆了三次绣了三次,马字下边四个点儿间距总摆不匀,现在这样还可以吧。”我感觉此刻任何语言都无力于心情的表达。妹妹告诉我,她还换了一次线呢,开头用的是粉红色的线,觉得不显眼,便换成了黄线。妹妹笑着对母亲说,你要是再拆再绣,布就扎破了。什么力量使她克制着眼睛里发浑的玻璃体,顽强地使每一针都依从心意、不含糊地绣下去?

母亲为我扎红时十分认真。她两手执带绕过我的腰时,只说一句:“你的腰好粗呵。”随后调整带面,正面朝外,再把带子两端汇集到腰前正中,拉紧拉直;结扣时更是着意要像蝴蝶结那样好看,并把带端的字露在表面。她做得一丝不苟,庄重不阿,有一种仪式感,叫我感受到这一古老风俗里有一种对生命的敬畏,还有世代对传衍的郑重。

我比母亲高出一头还多,低头正好看着她的头顶,她稀疏的白发中间,露出光亮的头皮,就像我们从干涸的秋水看到了洁净的河床。母

亲真的老了,尽管我坚信自己有很强的能力,却无力使母亲重返往昔的生活——母亲年轻时种种明亮鲜艳的形象就像看过的美丽的电影片段那样仍在我的记忆里。

然而此刻,我并没有陷入伤感。因为,活生生的生活证明着,我现在仍然拥有着人间最珍贵的母爱。我鬓角花白却依然是一个孩子,还在被母亲呵护着。而此刻,这种天性的母爱的执着、纯粹、深切、祝愿,全被一针针绣在红带上,温暖而有力地扎在我的腰间。

感谢母亲长寿,叫我们兄弟姐妹们一直有一个仍由母亲当家的家;在远方工作的手足每逢过年时依然能够其乐融融地回家过年,享受那种来自童年的深远而常在的情味,也享受着自己一种美好的人生情感的表达——孝顺。

孝,是中国作为人的准则的一个字。是一种缀满果实的树对根的敬意,是万物对大地的感恩,也是人性的回报和回报的人性。我相信,人生的幸福最终还来自自己的心灵。

此刻,心中更有一个祈望,让母亲再给我扎一次红腰带。

这想法有点神奇吗?不,人活着,什么美好的事都有可能。■

冯骥才 作家 画家 文化学者 天津大学教授

百味

初一

文/车前子

车前子
诗人 艺术家
自由撰稿人

不是初中一年级,是大年初一。我在北京生活多年,却不知道北京人怎么过大年初一。因为我总是回苏州过年的。尽管我回苏州的第一件事就是感冒。现在年纪大了,没人给我压岁钱,感冒也就不忘送见面礼。每年如此。过年就是怀旧,就是一句皱巴巴的缩脚语——把伸出故乡的脚收缩回来。这样说好似心一直在故乡似的,想想,也不是。

苏州的大年初一也在变化。去年我一醒来就喝“元宝茶”,今年就没喝到。父母是在一年之中衰老,因为儿女是在一夜之间懂事。老了的父母怕出门,也就没去买青橄榄。

“元宝茶”就是在新沏的茶水里放进一两枚青橄榄。橄榄的形状两头尖,与元宝是怎么也扯不到一起的,就像西班牙斗牛和法国蜗牛,但苏州人就是能把橄榄与元宝扯到一起。看来苏州人不是想象丰富就是发财心切。其实中国人的心理都有点发财心切,穷怕了。心态的浮躁属于经济现象,常常是社会贫

困的反映。

大年初一,要说吉利话,那么“发财”“发财”“恭喜发财”。

我还在做梦,被电话吵醒。一大早的,就有人给我父母拜年。想来都是他们的老朋友。年纪老了,反而更无忌讳,我抱紧被窝细细地听我母亲与人快乐地交流着高血压和药。

我们倒有很多忌讳,昨晚吃年夜饭,大妹妹就不让蒸鱼翻身,我则说吃鱼要留一点,这叫“年年有余”。有忌讳,说明有期待或者还有期待。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这样说好似父母没期待似的,当然不是。母亲看我起床,就去厨房下汤圆、煎年糕——这是日常生活里的隐喻:汤圆是“团团圆圆”,年糕是“高高兴兴”。也有“圆满”和“高升”的意思。

平日在北京,汤圆是能吃到的,年糕绝吃不到。其实在苏州,年糕也只在过年时才吃。我对饮食中的节令性质神往迷恋。这是仪式,有仪式就有诗意。八月半吃月饼,差不多是首格律诗,如果每个月

月半都吃月饼,那就是顺口溜了。纸袋“习俗”作响(我把“习俗”当拟声词用。说实话没有什么纸袋,只是一只塑料袋,但我讨厌塑料袋,写散文的时候凡是遇到塑料袋我一概转换成纸袋。风雅吧,风雅是不真实的,但自己喜欢),母亲从纸袋里拿出早已切好的年糕,一片一片,说实话是一块一块的,很厚。母亲说切不动。我想也可能年糕硬的缘故。前几年有对小夫妻不懂事,大年初一吵架,妻子顺手拿年糕一砸,丈夫就被砸晕了过去。也可能年糕并不硬,的确是母亲切不动了。因为有人说那妻子并没把年糕砸在丈夫头上,只砸在镜子上——那丈夫正对镜梳头,猛看到破碎的镜子带着他的脸缤纷坠落,以为脸没了。他是吓晕的。

年糕是绿色的。我问:“薄荷的吧?”

是薄荷的。“我以前怎么没吃过?”

父亲在一边喝茶,说:“不会。年糕一直是这两个品种,一种薄荷的,一种玫瑰的。”

看来我只记住玫瑰的了。那是稳稳的玫瑰红。

薄荷年糕的绿是沉沉的。这是沉沉的薄荷绿。

薄荷年糕也罢玫瑰年糕也罢,它们只有一个名字——写出来很煞风景,叫“猪油年糕”。除此之外,苏州的年糕还有就是“糖年糕”。“糖年糕”这名字好,大有田园风味。尽管糖摆满了烟纸店的瓶瓶罐罐,猪在田园里倒常常见到。

这猪油年糕是从“黄天源”买来的。“黄天源”是家糕团店,创建于1821年(清道光元年),能做近四百个种类的糕团。它的“玫瑰大方糕”留香在我少年的生活中。看来我能记住的还是玫瑰。

薄荷年糕裹了层薄薄的鸡蛋,在油锅里煎炸,它们竟能像春天的树叶一样舒放,真是奇迹。

“猪油年糕”和“糖年糕”的上面都会撒些桂花。薄荷年糕上的桂花是暗色的,仿佛不一会儿傍晚就来临了。■